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

吴泽文集

吴泽 著

第一卷



吴泽文集

第一卷

K0-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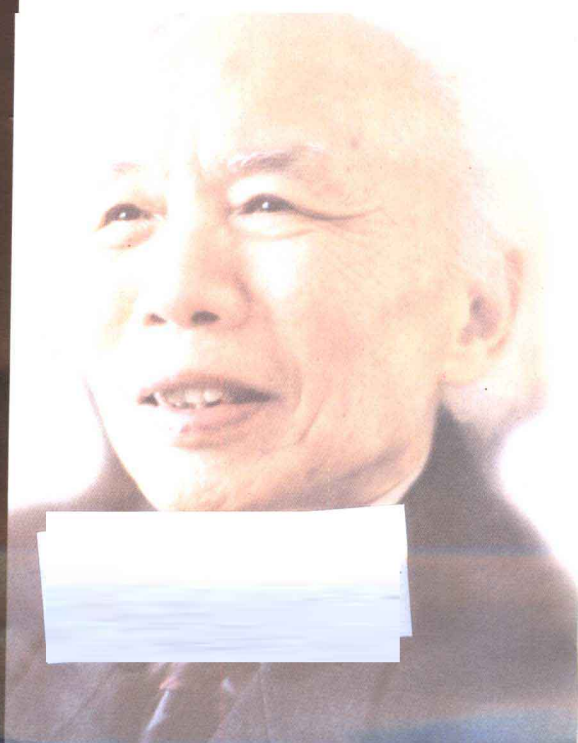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大系 · 古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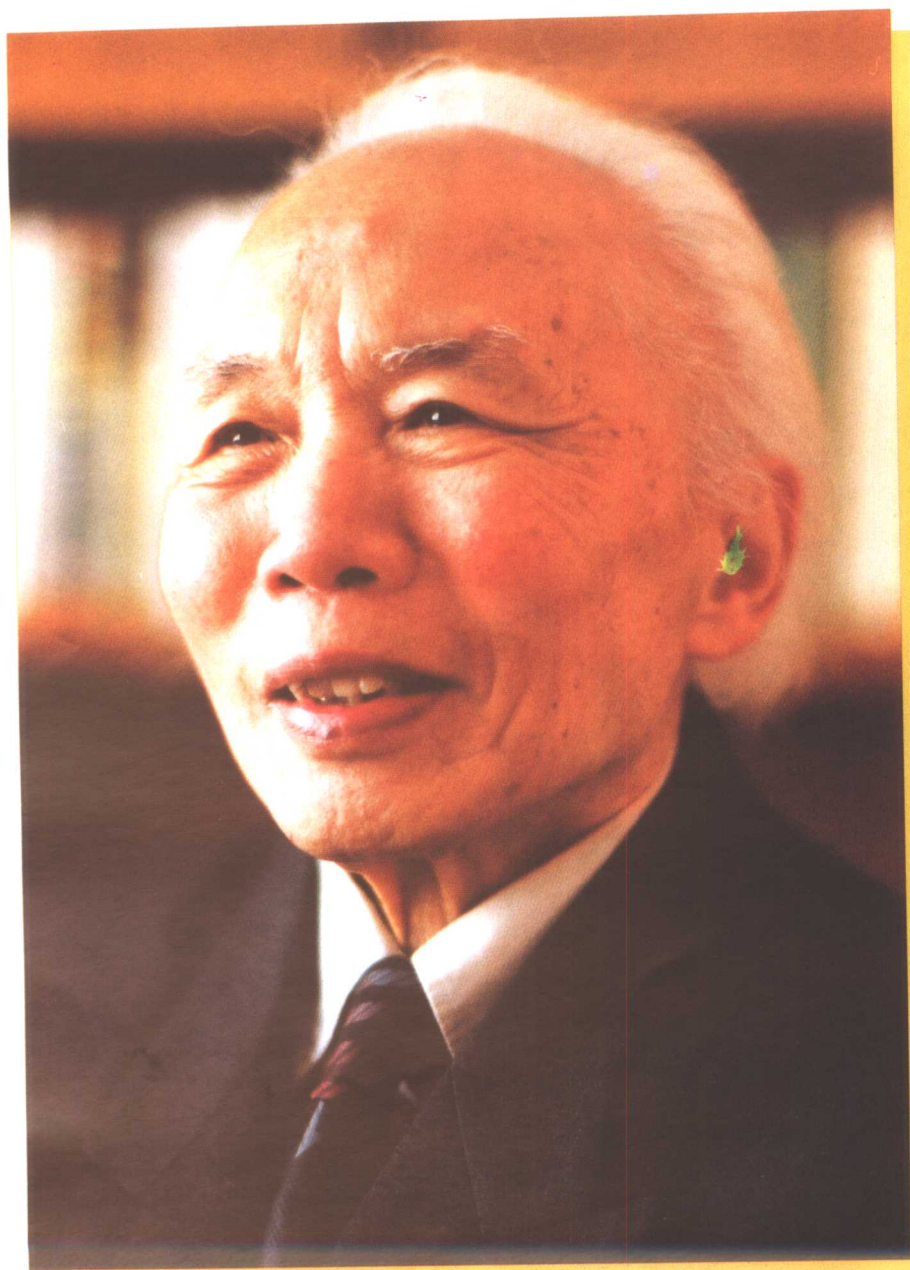
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泽著

王东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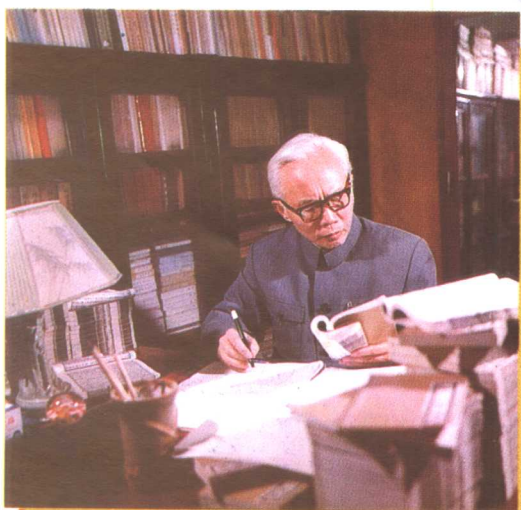
吴泽先生 (1913年1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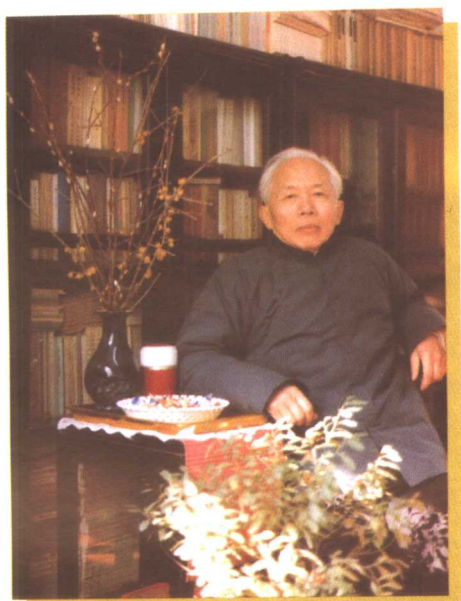
30年代的吴泽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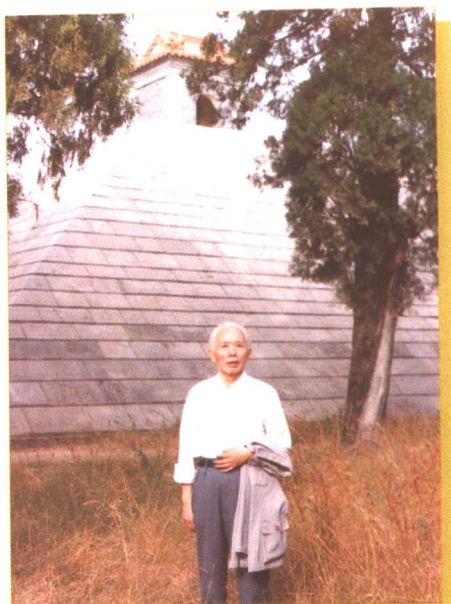
在大夏大学工作时期的吴泽先生。



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勤奋著述的吴泽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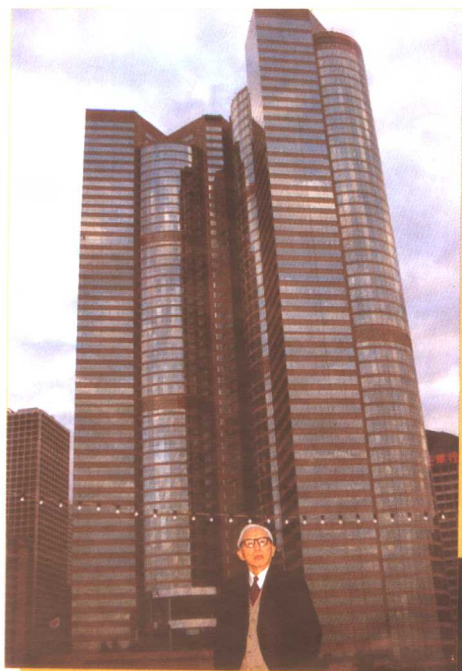
吴泽先生在书房。
摄于1984年。



1987年10月，吴泽先生
于山东曲阜少皞陵墓留影。



1988
年夏，吴泽
先生应邀
到沈阳辽
宁大学作
学术报告。



吴泽先生 1985
年到香港出席国际学
术会议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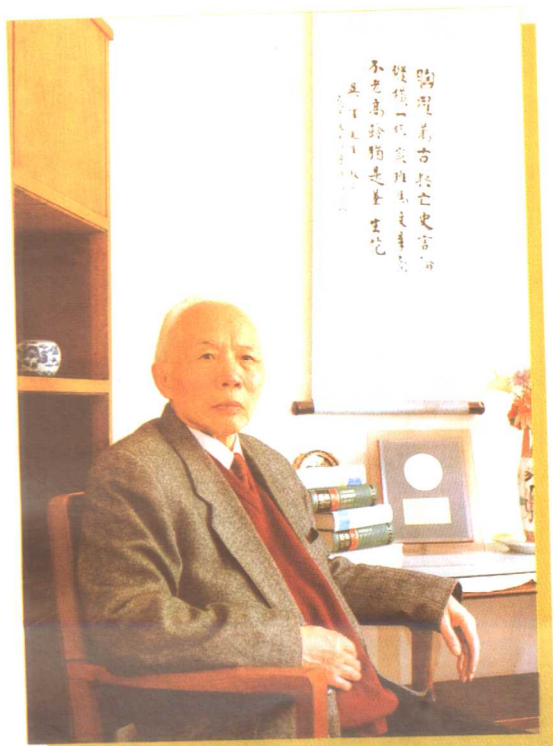


1992 年
的吴泽先生。

庆贺吴泽教授治学从教六十周年暨八十华诞



1993年，华东师大庆贺吴泽先生治学从教60周年暨80华诞。



1994年摄于客厅，墙上为上海南汇109岁老人苏局仙赠吴泽先生的一首诗：“胸罗万古兴亡史，言论纵横一作家，班马文章原不老，高龄犹是笔生花。”



1997年摄于华东师大图书馆前。



吴泽先生夫人高家莺女士60寿辰。摄于1998年。



吴泽先生八十八米寿。摄于2001年1月。

整理说明

《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初版于1949年，至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前后共印了六版。这次整理即以棠棣出版社1953年的修订本为底本。

在整理过程中，除更正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及印刷错误外，重点是放在统一标点符号上面。其原则如下：

一、原书为竖排本，所使用标点均为竖排式标点，现均改成横排式标点，如『』改为“”，「」改为“”，；改为《》等。

二、原书引用文献的书名和篇名大多未加标点，现依例统一加上书名号，如果书名与篇名相连，则标以间隔号，如《史记·殷本纪》。

三、原书引用甲骨书名，多取简称，并在第一次出现时，加以说明，如“前”即《殷墟书契前编》，“后”即《殷墟书契后编》，“铁”即《铁云藏龟》等，故于“前”、“后”等简称未加书名号。

四、原书中的青铜器名称，或而加引号，或而加书名号，现统一改为书名号。

又，原书注释不尽统一，有的放在节后，有

的置于章末,今统一放置章末。

原书附有大量器物照片,由于时间久远,大多模糊,且一时又难以重新复制,故此次整理时,一并删除。

王 东

2000年9月1日

我的治学历程

——代序

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我一直从事历史学这门古老而常新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十多年前，江苏省一家出版社曾约我将几十年来有关学术研究的文字汇编成一部文集。从那时起，我一面忙于《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一书的定稿，一面便在学生的协助下，开始《文集》的编辑工作。经“文革”的浩劫，以前保存的有关期刊与样书，已十不得一二。于是在几年之间，学生们多次赴北京、南京和重庆等地，搜集、复印有关资料，自己也聚精集魄，致力于《文集》的校理。岂料由于年龄的关系，其间竟多次因病住院，此后出版界也面临多重困难，故而此事便搁置下来。这次《文集》的出版，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相助，盛情厚意，深为感荷，谨致谢忱。读其书，知其人。值此《文集》行将付印之际，兹将往时为研究生所讲述的治学经历整理成文，作为《文集》的前言，同时也算是对自己生平治学的一个总结。

一、学历与学术渊源

1. 家世与学历

我原名瑶青，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渔，江苏省武进县人。1913年1月18日，我出生在武进县城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的一个农村家庭。我的祖父英年早逝，我的父亲也在我刚满二岁时就因病去世。我和我的哥哥，都是在祖母和母亲日耕夜织的辛劳下，才艰难地长大成人的。

七岁那年，母亲送我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当时，在私塾读书的学生，大多是本村或附近乡村的同族子弟。我家境贫寒，加之父亲早年去世，因此在塾中备受歧视和欺凌。在我稚嫩的心田里，很早就埋下了求上进、争平等的思想幼芽。

在这间私塾里，我前后读了三年。像当时所有的私塾一
2 样，我在这里所学的不外乎“子曰”、“诗云”那一套，但对我后来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却具有启蒙的意义。

早在我就读私塾之时，新式的学堂已开始在苏南一带普及开来。考虑到我在塾中的现实处境，母亲决定让我离开这里，把我转到蠡河镇上一所新办的初级小学堂读书。正是在这间新式的学堂里，我开始接受了算术、绘画、手工、体育等新知识。不到一年，一位在无锡、常州一带高等小学堂任教的亲戚，因同情我家的处境，又带我到无锡和常州的小学读书。十五岁那年，我才读完高小，考入常州中学。1930年夏天，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附属高中部。

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对挣扎在当时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的疾苦，知之甚切。加之贫寒的家境和不幸的身世，使我对人间的不平感受较深。但是，限于当时的年龄和识见，一切

都还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到了上海之后，目睹这个全国最大城市的繁荣兴盛，心中更是凭添感触。久而久之，一个又一个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疑问，开始在我的心中生成，并迫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

正是在上海读高中期间，我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教师和报刊杂志。通过他们的影响，我开始知道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一大堆新名词、新知识和新思想。日久天长之后，我对这些新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对这些新知识的了解，可谓十分肤浅，但却为我后来走上进步的道路，打下重要的理论基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以武力侵犯我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安内必先攘外”为幌子，拒不抗日，致使东北大片河山沦入敌手。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出于爱国热情，纷纷赶赴南京请愿。当时刚刚进入高二就读的我，也毅然加入了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的队伍。经过这次锻炼，我开始把一位渴望平等、追求进步的农村青年的朴素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初步地结合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上海的图书馆里，读到了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刊。通过阅读这些书刊，使我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问题等，有着进一步的了解。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连串疑问，基本上都得到了解答。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对李达先生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当时，我常州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朱穆之，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我便写信给他，请他打听李达先生的情况。他在回信中告诉我，李达先生是北京中国大学的著名教授。就这样，在高中毕业那年，我

到北京投考中国大学，并有幸被录取，从而正式事师李达先生。

1933年初秋，我来到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经济系。当时，李达师任经济系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李达师讲授的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故而人们都叫他“红色教授”。除李达师之外，还有黄松龄师、吕振羽师和杜叔林师等，都是知名一时的教授。记得当时黄松龄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吕振羽师则讲授《中国经济史》，而杜叔林师则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等。为了提高我们对学术的兴趣，李达师还亲自组织经济学学术研究会等活动。正是在这些进步师长的指导和关心下，我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一步一步地走到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进犯我国华北地区。这年6月，国民党政府派亲日分子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不久，又签订了《秦土协定》。这样，华北、察哈尔的主权又沦入敌手。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掀起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也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再一次经受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实践锻炼，并由此而对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有着更深刻的认识。1936年，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斗争。

次年7月初，我于中国大学正式毕业。然而，就在我行将离校之际，“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北京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7月底，我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再由天津乘船赴上海。此时，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正在进行，交通几乎断绝。

几经周折，我又乘船返回青岛，再由青岛至济南，然后经南京回到常州老家。

回到常州不久，我与几位旧时同学发起创办了《抗敌导报》，宣传全民族抗日，并指划抗日救亡之策，以激励民心，弘扬民族气节。在创刊号上，我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一文。由于文章对国民党当局有所指责，故而被捕入狱。不久，日军进犯苏、锡、常一带。我经亲友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回家的当天晚上，我又撰写了《庭讯》一文，寄给这时正在南京《金陵日报》任职的朱穆之，当即发表出来。文中披露了我在狱中受宪兵司令部审讯时的片断答问，并阐述了自己对于抗战前途的看法。10月间，常州危急。我携家离常，辗转镇江、武汉等地。1938年春，到达重庆，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和大夏大学。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这时，已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原先在北京执教的李达、吕振羽、侯外庐、张友渔以及翦伯赞、华岗等一大批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此时都汇集在重庆。整个抗战时期，我一方面在重庆从事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在学生中间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我的《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和《中国历史简编》等书，就是在重庆完成的。《古代史》一书的主旨及书名，是李达师亲自为我设计的，而《中国历史简编》则是吕振羽师交给我的任务。

5

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初，我去贵州赤水大夏大学任教。次年初月，大夏大学迁回上海，我也携家来到上海，继续在大夏大学任教。这年10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外，我还为迎接上海的解放而紧张地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担任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1951年，经过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从那时起，我便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在这期间，我曾担任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和名誉所长、上海市华侨史学会会长等职，并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两个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直到1998年，我才正式离休。

2. 师承与学术渊源

我在中国大学学习时，原本读的是经济系，可是读到“一二·九”运动前后，便一步一步转向历史学专业。这种学术转轨的缘由，一方面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个人的学术师承有关。

6

众所周知，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学术思想界曾先后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三次重要论战。这几次论战虽然只涉及到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但是论战的核心问题，却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论战的进展，一直扣动着那些关注国家前途与命运人士的心弦。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中国农村问题的我，也被论战深深地吸引着、牵动着。穿透历史的迷雾，揭示中国社会变迁的渊源流变，遂成为我心向往之的事业。

从学术承师方面来讲，如前所述，30年代的中国大学经济系，有李达、吕振羽、黄松龄等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李师和吕师都是当时论战中进步理论界的重要代表。他们所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经济史》等课程，对我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在教学之外,李达和吕振羽诸师等人,又纷纷著书立说,阐述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特别是吕师,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之后,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论证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并首创西周封建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吕师的学术见解,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很大。正是在老师们的教导下,我开始懂得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要真正认清现实,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历史;要从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于是,我开始把原先对农村经济的浓厚兴趣,转而化作对中国经济史的认真探研,再由中国经济史而扩展到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等各个层面。就这样,我的学习专业终于从经济学转向了历史学,并把它作为自己毕生所从事的学术事业。

二、治学历程:四个时期

7

我在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这三个方面。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这三个基本研究方向的侧重面和着力点,前后也有所变化。大致说来,我的治学历程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分成四个时期。

1. 第一个时期(1935—1946年)

我在中国大学经济系就读的前期,最注意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对世界经济问题也很感兴趣。记得在1934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一年来国际经济的回顾与展望》的论文,刊登在北京《众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上。这是我大学时代第一篇关于世界经济的论文。稍后,随着专业的转向,我开始